

读荀恨晚

王蒙

荀子曾经与孟子齐名。前者主张性恶，后者主张性善。当然，孟子位居“亚圣”，荀子在后世的影响比不上人家，这与时间的先后次序有关，也与性恶说在中国不占上风有关。传统文化是注重感情的文化，说人生而性恶，民众士人感情上都不好通过。

但荀子的重点不是骇人听闻、痛心疾首地揭露、拷问与哀叹人间的恶人恶行恶温情，像某些作家如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到诸恶时那样。荀子的调子是人生而难免有欲有私有争有恶，惜哉痛哉怜哉。荀子的性恶论带有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特色。他的性恶说，重点不是控诉、审判、斥责人世间与人类的低劣本性，而是强调礼义教化的不可或缺，圣王教化与管理不可或缺。他强调的是：仁义道德有赖于后天人文文化、圣贤文化、规范秩序培养、严刑峻法惩戒，还有天子与诸侯既仁爱又强势的治理。然后才能抑恶扬善，化恶为仁，在内圣外王的圣王带领下，构建天下归仁的太平与福祉。

他的性恶论易于与韩非子等的法家论述接轨，但荀子儒法兼收，儒学为主，在认同法、刑的重要意义同时，尤其强调仁心仁德、为政以德、教化至上、圣贤（精神导师）至上，强调礼制法制的严格规范性；同时，对于老人、残疾人、边缘之人等也有各种变通通融折扣的柔性思路。在某种意义上，荀子的性恶论有他的先进与务实处，与孔孟相比较，荀子接地气气多一些，高大浪漫的调门降了一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荀子含义丰富地引用并称颂《诗经》上的这两句诗，连通了孟子“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的名言，表现了他对于治理的立体性、多面性与可调整性的认知。尽管后世对这些说法有不无呆板与平庸自圆直至与原义相悖的解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个真正追求经世致用，并能联系治国平天下实际的大儒，与只会寻章摘句的腐儒截然不同。前者能坚持义理原则，也能具体地分析具体情状，还懂得开拓思路，调整部署。而后者，只能把学问把智慧的能动性搞成较劲的、缩手缩脚的死定义。

以礼经国、以乐辅礼、助礼、饰礼，以圣贤制礼乐，以德为政，以仁厚服人取天下，以严刑峻法保持威严，以战车军备御敌。以圣贤伟士人才自强，这是荀子之道的全面性、复合性与整体性。荀子最好的理想是备暴力强迫手段而不用，以软实力赢得民心——以王道得天下。这实在是极有特色的中华文化传统。

仁心在内，礼制在外，有阶级尊卑的秩序规则，有文质彬彬的言语举止，有对于犯上作乱的警惕禁忌惩戒，有兢兢业业的自我约束，有正心诚意慎独的自我自律修养，有以礼为先

为美的舆论共识，有是非荣辱之心，存是去非，求荣知耻，乃有规格、格调、正理、章法：生老病死、和战吉凶、朝廷内外、生杀予夺、民生百事、社会分工、资源分定、祭奠庄严、宗教神祇，都有礼乐、引领、规则、章法、节奏全覆盖，社会自然高雅太平，举止文明，各安其位，无乱无争，无邪少恶。

而且，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就指出：“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忠信爱敬之至矣，礼节文貌之盛矣……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这样的论述，既尊重人们的感受与习俗，又强调了礼的文化意义，而与愚昧迷信拉开了距离，其立论之清醒与实事求是，至今难得其右。

荀子相当平静地指出了欲与恶的存在，既保持了敬天的基因，又面对了天与人的区分与实际距离，提出与其和天较劲、不如致力于人事的纲领。同时荀子在中国传统文化论述中罕见地肯定了人欲的不可能去除、不必上火针砭、不需深恶痛绝。生而有欲乃至多欲，是正常的，是无法消灭的，不应该向大众提出压制或消灭欲望的口号。问题不在于有欲无欲，而在于你的欲导引了你的什么行为，有欲则可，因欲而行为不端、无礼违法则断然不允。以礼义规范欲，乃是文明；而以为可以以礼义消灭欲，则是狂悖呓语。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戒欲防欲制欲主流中，荀子为欲有所辩护通融，也是一家之言而振聋发聩。

孟子的性善论则给儒家思想披上了美好的理想，成为人间乐园、美德治平、天生孝悌的幸福长衫。天性即是人性，天心即是人心，天性善，这是儒家天人合一主张的重点。而老子天地不仁的说法，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天地、自然、世界的自作多情——酸的馒头（sentimental）。

荀子尤其强调礼，强调礼的文化性、规范性、治理性、祛恶性和和平性，同时强调礼的前提是义——道义与原则。道义与原则践行在外，诚于中而形于外，暖和于中而严正于外，乃构成礼——彬彬有礼、谦谦君子、以文化人、永不生乱。

一方面荀子介绍古礼，细致生动具体有趣，入情入理，可亲可爱；一方面，荀子又借孔子之口讲论：比起戴什么样的帽子的礼数来说，权力系统的人——天子、诸侯、公卿，更应该关心的是仁心人心良知正道。

比起《论语》《孟子》来说，《荀子》的篇幅要大得多。他讲的许多问题比较细、比较切合实情。

荀子专门讲了君道——天子、帝王、君王之道，强调一切都要遵循效仿唐尧、虞舜、夏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同时荀子又提出了“法后王”观点：他不搞复古，不认为中华文明唯古是瞻、越古越好。他倒还没有提出



瓷版画“八圣人”中的荀子。新华社资料片

厚今薄古，但颇有些厚古更厚今、活在当下的意思。他提出道义仁礼德的观念，认为这些带有终极价值意义的范畴其实是来自天地榜样垂范，来自圣人教化，是高于权势的，是决定权势被承载拥戴、抑或被颠覆毁灭之不同命运的，是具有崇高性权威性不可逆性的。他认为君王与贤良是要知天命的，是不可违背天命的，正如今日之强调不能违背历史与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

“不求知天”的重大命题：不赞成将心智用在宗教式的终极形而上空泛高论或占卜式的猜测赌博上，而是认同人间正道，认识人间的可与不可、能与不能、义与非义、礼与非礼，有所选择有所把握，有所修为，这甚至令人想起让·保罗·萨特的无神论的存在主义，想起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而荀子关心的首要，不在于萨特式知识分子的选择，而是君王权力系统的选择。荀子认为，坚持礼义与礼制，在不同的等级层次上践行守护仁德，搞清名分，确定万民万事（日理）万机的统类——性质，也就是孔子强调的正名，是治国理政的首要。

王者不仅合乎天道儒道，荀子还讲王制，即王者的治理法度。他说：“奸言，奸说，奸事，奸能，遁反侧之民，职而教之，须而待之，勉之以庆赏，惩之以刑罚。安职则畜，不安职则弃。五疾，上收而养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无遗。才行反时者死无赦。夫是之谓天德，是王者

之政也。”

意谓：“对于说话、主张、做事要手段、钻空子、不安分、偷奸使坏之人，要给予安置，加强教育，适当等待，有所鼓励引领，有所惩罚警示。能够接受安置的就让他们安定下来，不能接受安置的只好予以舍弃。”

“对于几种残疾人，君王要收养他们，使用他们的才具，救济他们的衣食，全面覆盖，不能遗漏。”

“而对于颠覆社会秩序的人，只能坚决处死，不能赦免。这样做，合于天道天德。这是王者的施政方略。”

这已经突破了儒学的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范畴和礼教，讲到一些精明强悍的用权手段和计谋了。虽然在其他地方，荀子多次反对治国理政的计谋化。

荀子讲正名，强调桀纣之类的独夫民贼、无道昏君，根本不能算君王，而伊尹、周公等的临时行使君王权柄，也绝非悖逆。荀子的治理思想，包含着对非治、悖逆形势的承认、解释与对策。

荀子强调：法者治之端（根据），君子，法之原。就是说要以人治保证法治。他说：明主，急得其人，闇主，急得其势，就是说，礼义第一，用人第二，炙手可热的权势只能叨陪第三。他的人治高于法治论现在看来也许不怎么对，但这些说法仍然惟妙惟肖，来自古代后代本土实践，令人觉得荀子实有朝廷官场政治生活经验，细腻详实。他描写的政治生活现象可闻可见可触可以务实评析，绝非凌空蹈虚之论。他没有孟子那样高调，但是比孟子扎实。

操作起来，他认为天子、诸侯君王们的主要职责任务是用贤人、清奸佞、赏罚分明、绳墨公平。荀子甚至强调说天子君王是正道驱动者、布局者、指挥者与裁判者，而做事处理日常政务主要是靠你用的“相”，以及贤良臣子。荀子认为，有好人好用，天子诸侯可以劳逸适度，可以更多地享受生活，可以更主动地评价监督调配，高高在上，主动在己，进退咸宜；当然，这只能是一个角度。历史上的“明君”，更多的是将决策与用人结合起来的。用毛主席的说法，是“出主意、用干部”，而邓小平的说法是：“抓头头，抓方针。”

荀子讲臣，把臣子分为几种，一曰态臣，靠表态作态取宠信者是也；二曰篡臣，做官而扩张权势、穷奢极欲乃至架空君王者也；三曰功臣，取得信任，办实事者也；四曰圣臣，忠诚于君王，忠诚于正道，有所完善，有所谏争，不但出色完成了君命，而且树立了典范、优化了形象，改善各方对于权力系统的舆论观感者也。

不用多说，这样的区分，相当地道！

荀子注意区分谄（媚）、忠（诚）、篡（夺）、国贼这四种为臣之道，荀子提出了谏、争、辅、拂这四种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并提出了从道不从君的说法。他高度评价了本土传统政治学对于谏争的讲究。

荀子对于君子小人的说法也极高妙。说小人为什么常戚戚呢？“小人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慌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此说令人如见其人其事，忍俊不禁。

在论述到诸侯国势强弱的时候，荀子更强调的是软实力，是君王仁心，是民心向背，是君王的人格修养、道德形象、以文化人之力量。

书中还有乐论，被今人称之为“礼乐同构论”。荀子谈音乐的专门知识很少，强调的是重大礼仪上的音乐使人庄重，正派的音乐在培养礼敬、诚信、恭顺、和谐的社会氛围、朝廷氛围、移风易俗方面具有巨大作用，同时严厉批评了墨子的非乐论。

荀子猛烈批墨子的狭隘、过度与呆木，荀子也极度轻蔑公孙龙等人的概念与逻辑推导质疑游戏；恰恰从中可以看，墨子的许多适宜于较低生产力水平的政策设计如薄葬、废乐等等，与公孙龙的思维训练曾经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士人对于被后世所称道的百家争鸣局面的负面感受。当然，荀子在具有充沛的使命担当、坚持正道同时，似有学术思想上拘泥平面化一面。荀子极力为孔子的诛少正卯辩护，强调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厉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种具有异己色彩的人是小人中的桀雄，荀子认为这样可能的反对派，比刑事犯罪如盗窃更危险，必须诛杀无赦，这有点过线了。

我们可以从《荀子》中读到一些与法家乃至道家相通的思想：关于把握好赏罚、关于权力系统的治理需要与民心结合起来，还有着国家的力量不能只看地盘，更要看君王公卿受拥戴程度等等。我们会想起老子所讲的“功成事遂，百姓皆曰，我自然”，我们也会想起韩非的“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这说明了荀子有后发优势，从孔到孟到荀，治理思想是有前进与发展的。

荀子的文字极有特色，写得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有的地方痛快淋漓，有的地方无微不至，有的地方渊博丰富，有的地方大义凛然。读起来如飨大餐，丰厚全席。

整个说来，我个人，长期缺少对于荀子的认真关注与足够重视，近四年，我读荀子，发挥荀，极有兴趣，痛感需要看重、再看重、多多看重荀子。

谒王维墓，谁人不想居辋川？

韩浩月

今冬又到西安。每次来都行色匆匆，这次待得久了些，有稍充足的时间，可以四处逛逛。住在咸阳的作家朋友许海涛说，兵马俑、华清池这样的地方，起码看过三遍以上了吧？这次带你看一看一般人寻不见的。他说了几个地点，说到王维墓的时候，我心里一动，说：“就去这。”

王维在我心目中，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个清冷的形象，比起李白的狂放与杜甫的悲怆，他并未给青少年时代的我留下太大影响。可人到中年，突然大爱王维，再回头念那些句子——“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天寒远山静，日暮长河急”，登时脑海里自动生成画面，心里浮躁全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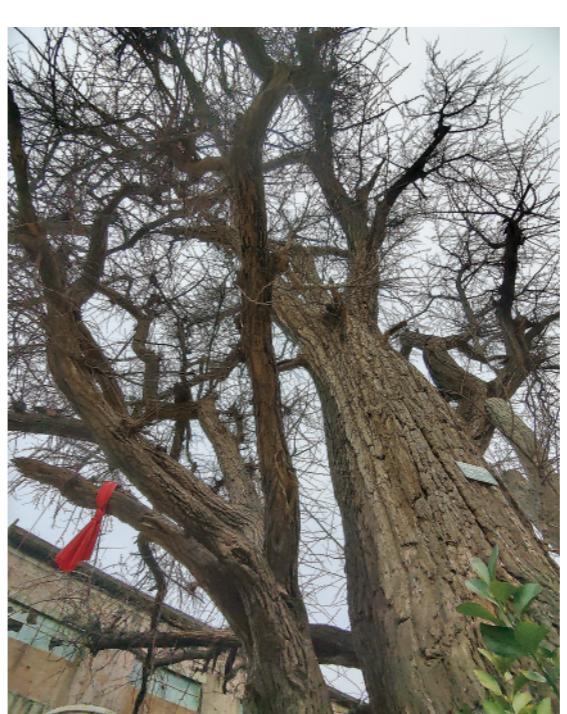
海涛兄开着白色越野，从他位于渭河北岸秦汉新城的家出发，过桥越河上了高速之后一路向秦岭深处的蓝田县辋川镇出发。2019年12月底，宋人临摹近十米长的《辋川图卷》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北京一个中年好友微信群里人头攒动，踊跃报名要去集体参观。王维在辋川半隐时40岁左右，恰是中年，我明白为什么他在当代有那么多中年粉丝了——谁不想居辋川？

手机地图导航，搜不到王维墓，只搜得到一个名字叫“王维庄园”的地方，到达之后发现，是一个不再营业的农庄饭馆。海涛兄胸有成竹，说他每隔两三年都来一次，一定能找得到，结果一脚油门几公里下去，还是没发现，可见王维墓隐藏之深。等调转车头缓慢行驶到一个破旧的工厂大铁门时，海涛兄的记忆复活了，连续说就在这里，没错。进大门后不过几百米，车轮碾压落叶的声音渐小，我们逐渐接近了王维墓。

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率先进入眼帘，树叶落尽，枯枝戳向天空，没有昏鸦，需仰视，才能看到树尖。树下有一块碑，上书“鹿苑寺”，碑背面刻文说，银杏树是王维亲手所栽，树冠



王维墓碑后的铭文。



王维墓旁的银杏树。 韩浩月摄

高20米，树径1.8米。据《新唐书》《蓝田县志》记载，“清源寺”即为“鹿苑寺”，据于唐末乱，鹿苑寺即竖在那里，碑面乌黑，字迹大而清晰，除了有些新之外，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在距离墓碑十几米的地方，我徘徊了几十秒钟，但最终还是决定走近它。为什么不敢那么快靠近？恐怕内心还是有种敬畏感，对一位伟大文人的敬畏，对历史与文化

的敬畏，当然，是不是还有一些别的未知因素在，就需要更加安静地思索探究了。

墓碑所在之处，是一片荒废的草园子。午后的山里没有风，冬阳送暖，一片安谧。不远处的废旧红砖厂房高墙危立，墙前，两名当地人手扶打扫工具，慢慢地说话。王维的墓碑在此，但他的墓呢？经查才知道，王维墓地约13.3亩，现被压在废旧工厂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不仅是中年心境的体现，也是对人生的通透表达。作为跨时代的同龄人，不需要达到王维境界的高处，哪怕摘得只花片叶，也能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

拜谒王维，心中有片刻激荡，并无惆怅、有无限安慰，并无失落。王维为官时，已看淡一切，住在辋川不只是隐居，也是一种抵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不仅是中年心境的体现，也是对人生的通透表达。作为跨时代的同龄人，不需要达到王维境界的高处，哪怕摘得只花片叶，也能得到一种内心的宁静。

或是与王维刚刚“碰过面”，告别辋川时，透过车窗，看到外面有间名为“辋川人家”的小店，店名四个鲜红的大字，挂满蛛网。以为会伤感，但回味了一下自己的心思，发现竟然是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的。王维在《偶然作》中写过，“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平淡与彻悟的背后，必然也隐藏着淡淡的喜悦。能用接纳与安静的心态，完成这次拜谒，也算我生命里一次小小的成长。